

海南幸有樊庶，庶几不负东坡

文 | 白金杰

读东坡海外诗文易，解东坡海外诗文难，难在“同情之了解”。天堑之隔，使得东坡海外诗文如同海外仙山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后世选家只能通过转引注释、遥体人情去忖度之、揣摩之，终究隔了一层。直至康熙四十一年(1702)，扬州人樊庶到海南临高任县令，亲临其境，才有了首部评批本东坡《海外集》。

樊庶之前，海南官方虽编纂过几部东坡选本，可惜都是无评无注的作品选编，殊乏特色。樊庶登岛后，觅得一部《居儋录》残编，颇为失望。他认为，苏轼“清忠亮节，凛凛海外”，诗文“晚岁为最”，其海外集竟粗陋至此，实在大不应该，遂立意编纂一部东坡海外集善本，以景行先贤，兼与海外共勉。

樊庶编本《海外集》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此前海外选本的篇幅，奠定了后世海外集的规模与体例，而且是海南唯一的评批本《海外集》。后世或许可以在樊庶选本的基础上追求体例、内容与注释方面的百尺竿头，却无法复制、超越之，毕竟明清两代集海南职官与性情才子于一身的评批者，仅樊庶一人而已。樊庶与东坡登岛时年岁相近，经历相似，能对苏轼笔下的海南风物如数家珍，也无须远寄遥想就能对苏轼的天涯苦旅感同身受。岭南督学曾为樊庶编本作序，称“临

与儋俱海外，千秋契合”，樊庶与苏轼“身与时舛，志共道申”，就点明了樊庶与苏轼在地理上与心理上的天然亲近。

樊庶编本中的注释多达千条，特别是对海南景观、风土人情的注解，别具史料价值。若非久处其中，必不能领会其佳处。如查慎行作《苏诗补注》注《儋耳山》时，只能转引《南方草木状》《琼州志》《方輿志》等史料，去考证儋耳山的来龙去脉，而樊庶则因公事路过儋耳山，亲眼见证过儋耳山的“山水秀丽，甲于他郡”，遂有评曰：“惜其沦于海外，为不幸耳。公此诗可为兹山吐气。”经樊庶诠释，方知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傍石，尽是补天馀”是苏轼真实的观感，而非文学的夸张。再如樊庶注苏轼《和停云四首》时，对“颺作海浑，天水溟濛”一句特别关注，因为在编集的前一年(康熙四十二年，1703)，临高刚经历过一次台风，樊庶作为临高县令主持了灾后重建的具体事宜，因此他一语便道破了此句的妙处：“琼南颺作，海水为之先浑。”若非亲历其事，不会格外留意这一处细节。

樊庶编本中的评点颇具个性色彩，有对海南风物的注解，对苏轼流寓生涯的同情，对苏轼诗文内涵的阐发，还有对苏轼人品文品的赞赏。在出任临高令之前，樊庶是

一位工诗善画的性情才子。他早年曾同翰林顾图河、史申义学诗，与江浙诸多才俊诗酒唱和。暮年远赴临高为官，樊庶亦未改当年的豪情雅兴，结交诸多岭南名士。有诗心，才能做得解诗人。樊庶曾这样评价苏轼的《到昌化军谢表》：“观公表中‘生无还期’句，至今为扼腕。不知章惇辈何心！英州不可而改惠州，惠州又不可，又必投之海外而始快。才之为时忌，抑何如是之烈哉！”激愤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也曾这样评价苏轼的《与王庠三首》(之二)：“读‘实务自枯槁，以求寂灭之乐’句，五百余年下，犹为公扼腕者久之。”同情之心，直抒胸臆。樊庶有诗心，也有慧眼。他能从《和停云诗四首》“良辰过鸟，逝不我停”，读出苏轼的“伤己之迟暮”，从“万里迟子，晨兴宵征。远虎在侧，以宁先生”，读出苏轼的“忧患”与“凄然”，从“弹指太息，浮云几何”读出“豁达”与“了然”，从“久矣此妙声，不闻蓬莱宫”读出“凄冷”与“惨恻”，字字珠玑，又情深意切，令人感慨。

苏轼最早的和陶诗写于扬州——樊庶的家乡，而最多的和陶诗则写于海南，这似乎注定了樊庶与苏轼的和陶诗的缘分。樊庶将所有和陶诗都收入《海外集》内，尽管这有损“海外”的体例，但保证了组诗气脉的连贯。樊庶认为，苏轼